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海钩沉】	王洪文的升沉	李 逊
【文革忏悔】	参加“梁效”，我不能原谅自己	汤一介
【亲历者言】	林彪“紧急指示”前后	李根清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海钩沉】

王洪文的升沉

• 李 逊 •

◇ 王洪文被关注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了解最初得之张春桥。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初回上海工作时，每隔几天就要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写书面报告，汇报上海情况。据徐景贤回忆，毛泽东当时“给了张春桥一个任务，要他物色新的上海市委领导的人选”。这样，从张春桥一系列书面汇报中，毛泽东陆续了解了工总司及王洪文的情况。

1967年一月夺权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成为市革会的七名主要负责人之一。而从当时市革会传阅文件的顺序看，王洪文排在最后第七名：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王洪文。

王洪文当了市革会领导后，一直比较谨慎，对中央各项恢复秩序的措施积极响应，也要求自己手下的工人造反派们紧跟中央部署。他对工人造反派有着很大影响，对他们容易逾越规范的草根行动有着很大约束力。上海除了1967年6、7、8月联司和支联站时期比较乱，其它时期一般都比外地平稳。尤其是1967年初，王洪文坚决主张吸收保守派入造反派，还有1967年下半年，王洪文坚决要求工总司下面的各联络站实行大联合，哪怕“和稀泥”也要实行联合。这些都是上海局势稳定的重要原因，王洪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洪文在工总司中有威信。他处事比一般造反派谨慎，行事正派，为人随和。工总司总部的一些老造反，相互之间会有所不服气，但对王洪文，除了早期的少数几个人，大家基本都是服贴的。

1967年7月21日至国情前夕，毛泽东一直住在上海。砸联司那天晚上还和张春桥乘着防弹轿车去外滩。看到工人造反派戴着藤编安全帽，手持长矛，守卫在市革会门前，毛泽东很高兴，说上海工人造反派能够掌控局势。后来，毛泽东在一场批斗会的电视实况转播

中，看到了王洪文的形象。当时王洪文正在批斗会上作总结发言，毛泽东仔细听着王洪文的讲话，张春桥在一边向他介绍王洪文的情况。据徐景贤后来的回忆，王洪文在电视中的形象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与王洪文第一次见面，是在1968年的10月1日国庆节。王洪文是上海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代表团的领队，和上海的许多代表们一起住进了中南海。10月1日那天，检阅游行队伍之后，马天水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时，说王洪文希望见主席，毛泽东同意了。（1）张春桥将王洪文带到屏风隔着的贵宾会见厅，随即离开，单独留下王洪文。林彪也在场。这次个别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徐景贤后来认为，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当众推荐王洪文，表扬上海工人，肯定上海局势，显示了毛泽东想从工人中提拔新生力量的念头，从1968年那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王洪文时便已开始。

王洪文“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是张春桥当初向毛泽东介绍王洪文时总结的，这样的条件很合毛泽东的心意。毛泽东后来一再对人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毛泽东还十分关心王洪文的文化程度，再三向张春桥打听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不过张春桥此时似乎没有体会出毛泽东的更深意图，只是将此看作是毛泽东对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关注：主席去年问过我一次，王洪文同志会不会写文章，今年又问过一次。为什么老是问，一方面是主席对王洪文同志很关心，更重要的是关心你们成长的问题。（2）

国庆观礼后，上海观礼团的其他代表都于10月12日集体离开北京，王洪文却没一起回沪，他被留下列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这个会从10月13日开到10月30日，会上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还批判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这是王洪文第一次参加党内高级会议。在10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赞扬了上海，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形势”。10月31日的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对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说：“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

因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关注，张春桥回上海后，将王洪文在市革会中的位置调整，排到徐景贤之前，紧挨在马天水、王少庸之后。徐景贤后来在回忆中说：“本来上海的红卫兵给我起的外号叫‘徐老三’，现在王洪文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王老三’”。在市革会，王洪文原来主要负责群众组织，以及工宣队、文攻武卫，这以后开始协助马天水全面负责上海的工作，还负责“清队”的专案。1968年下半年，被停止了近三年的中共党组织活动重又开始，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在筹备中。王洪文担任上海“九大”筹备小组负责人之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林彪宣读的政治报告中，特地提到上海工人对文革的作用：“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王洪文被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担任上海参加“九大”代表团的负责人；还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多次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中央还决定由王洪文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第二天的大会上作发言。这是一种象征：过去，这样一类全国性的大会往往安排劳动模范、先进人物作为工人阶级发言，作为全国工人的表率。而这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派却选择了工人中的造反派，树为全国工人的代表和表率。

安排王洪文发言，直到4月13日才由毛泽东最后拍板决定。王洪文特地向同参加“九大”的徐景贤借了十五元钱，去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上身穿着文革中流行的军装。既显示工人阶级的形象，也符合王洪文转业军人身份。4月14日，在周恩来、陈

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亲自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的这篇由徐景贤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审阅修改的发言稿，内容不长，完全是表态性的对九大各项决议的拥护以及贯彻的决心；发言的意义在于这是被精心安排的政治亮相。王洪文的名字通过这次发言，被媒体报道传播，全国乃至全世界知道了这个正在上升的新名字。在这次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和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杨富珍，都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马天水、金祖敏、陈敢峰、王维国，当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次会上，以林彪为首的军队干部，向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发起攻势，张春桥受到与会代表不点名围攻。江青又一次抢在事主前面，与张春桥一起向毛泽东告状并求救。毛泽东当然明白，对张春桥的围攻其实就是对自己发动文革的强烈不满，他又一次选择了江青和张春桥。虽然紧接着受到公开批判的是陈伯达，但是毛泽东与林彪的亲密关系已经出现裂痕。庐山会议结束后，江青在住处秘密接见了赴庐山参加会议的王洪文和徐景贤。江青对王洪文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应该听懂了江青的话，这句话传递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期望。（3）

◇ 奉调北京学习

1972年9月，王洪文奉调北京学习。这是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的，要他移交上海的工作，并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带个秘书，因为要在北京待上一段时间。据徐景贤后来回忆，王洪文不知中央调自己去学习什么，也不敢问张春桥，放下电话，就赶紧去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商量。大家都认为，林彪事件后，中央需要增补干部，王洪文去中央学习，肯定是被进一步重用，而且很可能会进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6日晚上，马、徐、王在锦江饭店小礼堂为王洪文饯行。第二天，王洪文带着秘书廖祖康，在虹桥机场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海市委的常委们赴机场为王洪文送行。

王洪文赴北京后，和张春桥、姚文元住在一起。中央对他的安排是一面跟着周恩来参加中央工作，一面学习。中央办公厅给王洪文送去马、恩、列、斯、毛著作，供他学习。这是对王洪文的培养和考察。尤其毛泽东，更是密切关注着王洪文。毛泽东等王洪文安顿下来以后，连续找他谈了几次话。详细地询问他的历史，并且在交谈中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和观点，既对王洪文进行考察和面试，又对他进行开导和帮助。毛泽东还关照周恩来亲自帮带王洪文，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周都通知王洪文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连绝密的讨论运载火箭把人造卫星送上天的专案会议，都要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这也是周恩来对王洪文的帮教和考察。

（4）

王洪文小心谨慎，努力按照中央要求去做。中央说调他去北京是为了加强学习，他也就努力认真学习，还向上海市委徐景贤提出，将萧木调去北京继续做他的学习辅导员。（5）徐景贤十分不情愿放萧木离开上海，因为萧木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主力，工作努力，笔头也好，此时正在与陈冀德筹办《朝霞》杂志；但既然王洪文点名，他只好放人。王洪文还要求徐景贤帮他物色一个英语老师，他要学英语，因为毛主席也在学英语。徐景贤后来从复旦大学外语系调去一个英语教师，从A B C D开始教王洪文。

此时的王洪文踌躇满志。他整天不是学习就是开会，毛泽东还派他去新疆、浙江等地区，处理因群众组织派别对立而长期遗留的矛盾。王洪文自己本来就是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又作为上海市革会负责人，专门处理上海群众组织之间的纠纷，在这方面有经验。虽然对于群众组织的两派尤其对于上海邻居浙江的两派，他心底有倾向，但首次作为中央代表，他基本按中央要求处理矛盾，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满意。据说，毛泽东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做

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都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了。

不久，张春桥告诉上海市委的徐景贤等：看样子，洪文回不来了；经他和姚文元、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马天水主持。这是王洪文将留在中央工作的信号，毛泽东欣赏王洪文。接班人问题一直是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一个心病，现在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了。

但王洪文毕竟从政时间很短，没有资历。没有资历不仅是经验不足，也使人无法从资历中了解其真实能力和品德，所以毛泽东似乎对自己又一次选的这个接班人还是有些不放心。中共十次代表大会筹备召开之前，毛泽东要王洪文看《刘盆子传》。王洪文没有听清毛泽东要他看的究竟是什么，也不敢多问，他趁回上海调查研究时，找写作组的朱永嘉等，说要读刘什么子。朱永嘉猜出是“刘盆子”。刘盆子是《二十四史》中《后汉书》里的一个人物，原本是个放牛娃，赤眉起义时被立为皇帝，但根本胜任不了皇帝的职务。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的朱永嘉，听说毛泽东要王洪文看这篇文章，马上领会到毛泽东的意思，是希望王洪文不要像刘盆子那样，不成大器扶不起。但朱永嘉不便明说。朱永嘉去和徐景贤商量，徐景贤出主意：只按文章的字面意思，将古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不作任何其他解释和议论。朱永嘉照此办理，逐字逐句翻译了一遍。王洪文听着，不动声色，没有任何表示。徐景贤和朱永嘉都认为王洪文是个明白人，他应该明白毛泽东的弦外之音。〔6〕

王洪文去中央后，很不习惯中央的行事规则。他给马天水打电话说自己非常寂寞，有时一整天就是开会。〔7〕

◇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3年5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第十次代表大会筹备事宜。周恩来宣布，根据毛泽东提议，政治局决定将王洪文调到中央，列席政治局并参加工作；根据毛泽东意见，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的说明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由于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只选出一个主席即毛泽东，一个副主席即林彪。林彪事件后，中共中央主席便只剩毛泽东一人，政治局内，三分之一被认为是亲林彪者，或死亡如叶群，或被审查如陈伯达、黄永胜等，补充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成为当务之急；而且那个将林彪立为接班人的“九大”党章也急需修改。

最初王洪文负责的班子，写出的是《关于党章修改的说明》，只是个事务性的报告。报告送上去后，在“十大”召开的前三天左右，被送了回来。上面是毛泽东的笔迹：“说明”二字被划去，改为“报告”二字，再下面写着“王洪文”三字。〔8〕毛泽东决定由王洪文在“十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共前几次党代会上的党章修改报告，一般都由即将升任为毛泽东副手者作：“七大”是刘少奇，“八大”是邓小平，“九大”没有这个内容。“十大”由王洪文作这个报告，这表明，毛泽东要重用王洪文。

8月20日，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召开，虽然毛泽东没有到会，但他让周恩来宣布了一个更具震撼性的决定：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而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等排在王洪文名后，都任副主任。周恩来宣布了毛的这个决定后，立即谦恭地从主持人的席位上退让，请王洪文接着主持会议。一百多个参加会议者立即明白了毛泽东要让王洪文当他的接班人的意图。

毛泽东的这个意图遭到抵制。“十大”召开前，在周恩来主持的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上，当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让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提议后，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们都不表态；张春桥和姚文元因为大家都不吭声，也不便表态，场面十分尴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提出：副主席一个就可以了，他的意思很清楚：周恩来担任副主席，不赞成将王洪文放上去。为了“打通思想”，“统一认识”，8月23日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传达和解释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思想，说服大家不要看不起“儿童团”。尽管如此，许世友仍然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毛主席的意见”，许世友当众大声呵斥：“你有什么了不起”。周恩来讲完后，到老会的老干部们用掌声表达对周恩来的敬意。但轮到王洪文讲话，讲话结束时一片沉默，没有人鼓掌。讨论由谁作修改党章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央高层干部对王洪文不认可，使王洪文从一开始感觉到老干部们对自己的抵制。王洪文以后对徐景贤提及当时情景仍不能释然。

马天水也出席了这次会议。面对沉默的集体抵制，马天水以自己老干部的身份为王洪文说话：“我打头阵表了态，表示支持和拥护王洪文为党中央副主席候选人。我当时说：我同王洪文相处一段时间，觉得王洪文看问题还比较全面，不是一个冲冲杀杀的人，他在上海主持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我感到他比我强”。〔9〕

1973年8月24日下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出席并主持大会。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中央，左右是王洪文与周恩来。毛泽东宣布，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后，由穿着崭新军装戴着领章帽徽的王洪文念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修改党章的报告。8月28日，“十大”闭幕会，毛泽东没有出席。但在投票选举中央委员时，周恩来宣布：“今天的大会，毛主席请假；毛主席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选举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王洪文站起，走到毛泽东座位前，拿起桌上放着的毛泽东的选票，走向投票箱将选票投了进去。毛泽东的这一系列安排，使王洪文闪亮登场，一下站到了中国政治的前沿。接着，8月31日，全国报刊统一刊登了前一天举行的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新闻公报，其中，最具新闻意义的就是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为自己挑选的接班人，前两次是刘少奇与林彪。〔10〕

◇ 受命王维国专案

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王洪文负责上海的“批陈整风”，即批判陈伯达。第二年9月13日林彪外逃死亡事件发生。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林彪专案组，华东地区的林彪案件，由许世友和王洪文负责，上海设材料组。王洪文推荐，经许世友同意，由戴立清具体负责专案工作；将王知常调去负责文字工作。另外，还调去驻市总工会的军代表康宁一，空军和警备区的一些军人，共八九人，组成专案组。最初的材料都直接报周恩来，同时也报许世友和张春桥，但不经上海市委和警备区的其他领导。

在对王维国专案的一些处理上，王洪文和许世友经常争论，意见不一。矛盾具体体现在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清查上。林彪案件在上海和江浙一带，对象主要是驻上海的空四军和驻杭州的空五军。毛泽东派许世友和王洪文一起去浙江处理空五军问题。王洪文认为对空五军的干部应以教育为主，不主张都处理。许世友的观点不同。对上海的空四军干部也是这样，“王维国专案组”前后共审查56人，其中除4人上报中央“林彪专案组”审查外，其余人员经过一段时间审查后，都没有正式结论，也即没有硬给他们做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结论。以后都移交空四军处理。〔11〕王洪文这样做，可能是想为这些军队干部留

有些余地。王维国的妻子杜贵珍，被认为“参与了王维国一系列反党活动”，但王洪文认为不能因为丈夫的事情株连妻子，在审查了一段时间后将她释放。还有其他许多人，例如李伟信的弟弟李伟隼，空四军政治秘书处韩洪奎，等等，王洪文认为他们不了解真相，只是执行者，责任不应由他们负，对他们从宽处理。文革结束后，这成为王洪文的罪名之一，说他包庇这些人，企图拉拢他们从而把他们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些人也都被重新处理。

此外，许世友在处理驻上海空四军干部问题时，将所有原来空四军的高级干部都换班，另外派人。王洪文认为不妥。张春桥也认为不能怪下面干部，主要是上面的责任。王洪文主张原来的班子能保留的尽量保留，不要另外再派人，打击面不要太宽，包括在杭州的空五军。原空四军军长郑长华，是五十年代初期的空军战斗英雄。据说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曾说过：对那些战斗英雄要保。（12）在王洪文上报的关于郑长华的材料中，只说郑曾经吹捧过林彪父子，至于是否参与过林彪的活动，认为查无实据。王洪文希望保留郑长华的空四军军长职务；许世友决定调郑长华去南京军区审查，王洪文拒不肯放，说“在空四军保留这么一个人有好处”。他让郑长华继续主持空四军工作，并对他说：“我还是信任你的”，“你大胆工作”。但南京军区方面执意要对郑长华进行审查，1972年郑长华被送中央专案组审查。王洪文叹道：“这样一来，我想保留郑长华当军长又不成了。”（13）王洪文的一些主张和做法，许多都与许世友发生矛盾。王洪文还试图放宽对浙江空五军陈励耘等人的处理，也都被许世友坚决拒绝。（14）

◇ 王洪文终被抛弃

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跟着周恩来工作，周恩来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与王洪文共同署名。1974年6月，周恩来病重住院。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时期，也正是四届人大酝酿名单的最后阶段，江青希望能掌控以后的国务院，一次又一次地要王洪文向毛泽东进言。身为副主席的王洪文，虽然在党内地位排名比江青和张春桥高，但却跟着江青等的指挥亦步亦趋。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加上姚文元是“四人帮”、“上海帮”。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遵从江青之意，赴长沙见毛泽东，反对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此时对政治欲望强烈却又到处树敌的江青不满，他更对身为副主席，却总是跟在江青等屁股后面转的王洪文失望。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但王洪文没有悟出毛泽东不满的严重性；或者，他无力也无意摆脱江青和张春桥的控制。他本来个人意志就不强大，在上海工总司时就被认为“耳朵软”。到中央工作，没有政治和人脉资源，更无政治经验尤其是高层政治生活的经验，只能听命于江青和张春桥。何况他是张春桥一手提拔的，过去他与张春桥是教诲和被教诲的关系；现在尽管领导关系变了，张春桥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直接教导他；但张春桥的判断和主张，在双方关系中的影响矢量没变。以他的能力，根本不能和张春桥相比，无法抗衡张春桥。加上对文革的共同观点和利益，他根本无法如毛泽东所希望，跳出“四人帮”圈子，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

12月23日，王洪文又赴长沙见毛泽东，这次是和周恩来一起去的，在长沙住了三天，27日回北京。毛泽东再一次要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王洪文在长沙期间，向毛泽东写了份检查：

主席：

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的接受主

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10月17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解决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15）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十几名政治局委员在住处开会。毛泽东长达两小时的讲话，主要内容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要求加强党内团结，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毛泽东还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前一时期的“批经验主义”进行批评。从可以见到的材料来看，毛泽东似乎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张春桥，这是唯一的一次。但是，即使可能是唯一的批评，毛泽东也是以批评自己的形式作的：“我也犯了错误……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16）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无坚决清除江青之意，对江青充其量只是告诫和批评，这也应该是王洪文无力摆脱江青的最重要原因。但周恩来抓住了毛泽东的批评，布置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的讲话。周恩来因病不能主持会议，决定由王洪文召集。王洪文一再推托，拖着不召开会议。5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17）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毛泽东始终在一边观察。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政治能力失望。王洪文自己在许多方面也不思进取：一次接待一个国家总统，他本应事先准备，了解对方国家情况。可他对外交部送给他的资料连看也不看。第二天接待时，什么也谈不出，只好翻来覆去地问那个总统：你到中国饭吃得惯吧，住得惯吧。外交部工作人员存心如实记下王洪文的这些话，写成简报，报送毛泽东，据说毛泽东看了很生气。（18）王洪文的文化知识也让毛泽东无法与之交流。毛泽东对反文革势力总是忧心忡忡，担心“复辟”。一次他对王洪文讲起张勋复辟的事，王洪文不知张勋是谁，问毛泽东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只好说“你自己去查”。（19）

对王洪文直升机式的提拔，使得王洪文既无法在各个台阶积累工作和政治经验，也无法在各个领域和地区积累人脉资源。更重要的是，毛泽东选拔文革造反派作为自己的副手，却不能被文革的反对者尤其广大的老干部接受。毛泽东再一次抛弃自己选拔的接班人。毛泽东向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6月下旬，王洪文回上海和浙江“帮助工作”。7月1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工作，毛泽东批示“同意”。从7月初开始，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从此，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20）

对于王洪文的工作能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萧木有着评价：

比起一般工人，王洪文无论是在考虑和处理事情的能力上，还是在政治上，要强一些。他如果是一步一步地上去，在各种位置上受到锻炼，也许有可能会锻炼出工作经验和能力。但他却是一下子被提拔上去的，这使他的经验能力与责任严重不对称。而且王洪文实际是奉命造反，没有独立判断政治是非的能力。他对政治是非的判断标准就是“最高指示”，毛泽东的话。（21）

1975年7月，失意的王洪文回了上海。同行的廖祖康通知市委办公室，给王洪文准备一间办公用房间。不过人们没有听出言外之音：王洪文打算长住上海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不知道北京发生的事情，不知道王洪文已经失宠于毛泽东。王洪文向他们透露了中央的斗争，说：“当前中央斗争很复杂，要有上山打游击的准备”；8月19日，王洪文去上棉三十厂，临走时说：“只要我不被打倒，不死，下次还要来的。右派上台，我就来不了了”。（22）回康办的路上，同行的王秀珍觉得他刚才的话不妥，说：你这句话讲得太露骨了，能这样吗？王洪文答：“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文化大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远没有解决，有些人根本不承认我这个副主席，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不承认新干部，好多地方新干部都被打下去。还要围绕文化大革命再斗。你看邓小平的讲话，不就清楚了吗？”

（23）另一次，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楼上，王洪文边喝酒边埋怨：“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现在有什么权？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他（指邓小平）的，军队也是他的，我只有一个办工农兵读书班的权！这是毛主席定的呀！”（24）

王洪文在上海无所事事，除了视察工作，很多时间放在吃喝、打猎、钓鱼、看电影。后来他对人说：“去年我回上海，实际上是半休息状态，太气了”。（25）而此时，“王洪文犯错误了”的消息悄悄在干部间流传。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很着急。马天水说：洪文在上海没事干，邓小平这个人很能抓权，我们要劝他赶快回北京。他老不回北京，慢慢权没有了，在群众中影响也没有了。徐景贤说：洪文回北京一见报，政治谣言也就会没有了。要他赶快回北京抓工作。王秀珍说：我们劝他回北京好，他在上海也没事做，情绪不高。大寨会议他没参加不要紧，计划会议他要参加，代表工人在会上讲话。（26）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次劝王洪文回去。11月15日王洪文终于回北京。但回北京后，吃喝打猎钓鱼依旧。请王洪文吃饭喝酒最多的是叶剑英，有时半夜三更也会打电话将王洪文叫去。王洪文大概认为中央高干都是这样，吃吃喝喝是一种干部待遇；或者他觉得自己已经被高层政治遗弃，不再被信任，所以也不再愿意收紧骨头谨慎行事。他的秘书看不下去，说：“王洪文这个人完蛋了，照这种样子，肯定完蛋”。这个秘书打报告，执意离开王洪文，后来在文革结束前的半年，终于如愿。（27）金祖敏曾经劝过王洪文珍惜机会，好好学习，王洪文听了很不高兴。（28）萧木也曾经劝过王洪文。一次王洪文又被叶剑英叫去喝酒，酒席散后，萧木与王洪文整整谈了三小时。萧木以老师的身份，劝王洪文不要沉湎于吃喝打兔子。王洪文听着，最后表示：

我有我的难处，我难以开展工作，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十大”的路线。我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更是不被承认。只有叶帅还是支持我的。所以叶帅叫我来，我也不好推辞。（29）

整个邓小平主政时期，王洪文情绪都十分低落。直到1975年底，名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实为批判邓小平的运动开展，王洪文才又重新活跃起来。不久，因北京群众悼念周恩来，引发1976年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革职。但王洪文也没有因此重新复权。接替邓小平的是华国锋，毛泽东再次挑选的接班人。毛泽东不会想到，这个接班人，将

结束他视为自己一生所作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文革。华国锋将永远结束王洪文的政治生涯。

注释：

〔1〕司马东去《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

〔2〕《张春桥1970年5月1日下午在康平路小礼堂接见工总司委员时的谈话》，工总司1967年5月2日。原件藏上海市总工会。

〔3〕这一节的资料，除注明出处的之外，全部引自徐景贤《十年一梦》。

〔4〕徐景贤《十年一梦》。

〔5〕王洪文在北京有两个秘书，一个工作秘书小沈，另一个生活秘书廖祖康，国棉十七厂造反时就一直跟着王洪文的原厂技校学生。两个秘书已经属多；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北京都只有一个秘书。萧木作为王洪文的政治辅导员调去王洪文身边，文革后有人说萧木是徐景贤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安排插在王洪文身边的钉子，显然与事实不符。萧木是王洪文自己点名要求调到北京的。

〔6〕以上资料均主要引自徐景贤《十年一梦》。

〔7〕转引自张春桥1972年11月2日下午在接见市工代会部分委员时的讲话。上海市工代会会议记录。原件为上海市总工会文书档案。

〔8〕这是萧木对笔者回忆的，他参加了《关于党章修改说明》的起草。

〔9〕马天水1976年11月21日《我的补充揭发交代》，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25日印发，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资料库》。

〔10〕本节内容除注明的外，其余皆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以及徐景贤《十年一梦》。

〔11〕《上海文革史话》第641页。

〔12〕这是参加过王维国专案审查的王知常告诉笔者的。

〔13〕《上海文革史话》第642页。

〔14〕《上海文革史话》第643页。

〔15〕转引自薛庆超著《中国现代史论：中国外交重大突破毛泽东的南方决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16〕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731页。

〔17〕此小节资料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734页。

〔18〕笔者1989年8月对金祖敏的访谈。

〔19〕这是萧木告诉笔者的。

〔20〕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态度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739页。

〔21〕这是2007年间，一次笔者向萧木问起王洪文的工作能力时，萧木对笔者说的。

〔22〕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帮”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1977年3月《反党分子王洪文的罪行年表》。

〔23〕王秀珍1978年3月29日《补充交代与王洪文的反革命罪行》。

〔24〕徐景贤1976年11月5日《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待》，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资料库》。

〔25〕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帮”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1977年3月《反党分子王洪文的罪行年表》。

〔26〕王秀珍1978年12月24日。

〔27〕笔者1989年8月对金祖敏的访谈。

〔28〕同上。

〔29〕这是萧木对笔者说的。

（本文为《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中的一节）

□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10期

~~~~~

# 【文革忏悔】

参加“梁效”，我不能原谅自己

· 汤一介 ·

任何人在他的一生中总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些错误会得到别人谅解，甚至自己也可以原谅自己，但是有些错误是不会得到别人谅解，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我参加“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即“梁效”）是属于后一种情况。这事虽已过近三十年，而且组织上也不下结论，但在我心中总是一个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交代。这二三十年，我常常想着这个问题：要不要说说这个问题呢？时而觉得应该做个认真的自己批判；时而想，事情已经过去了，谈多了还会引起误会。现在趁我写回忆时，也许是把这个“我与梁效”作一交代的好机会。

## ◇ “文革”开始即受批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贴出后来被毛主席称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和哲学系另外反对聂元梓的十七位同仁被打成“黑帮”，每天要在校内劳动，或打扫厕所，或在广场上拔草，或清扫马路等等。举着“黑帮×××”的大牌子接受批斗，要低头弯腰或坐喷气式，校长陆平被批斗时我们往往要陪斗，这时我们都要举着“黑帮×××”的大牌子站在一个高台上，下面是众多批判我们的革命群众，这时我最担心的是牌子拿不住掉下去，砸在革命群众的头上，这样我不被当场打死，也得成为“现行反革命”，因而批判我们的内容反而一句也没听到。我家和冯友兰先生相连，当时冯先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目标很大，到北大来串联的各地红卫兵，都要把冯先生揪出来批斗，我往往也要陪斗。红卫兵小将让我们站在一个凳子上，他们把我们围在中间，要我们交代“罪行”，对此我们当然早有准备，说自己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犯了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教书中“放了毒”毒害了青年学生等等。照例，红卫兵小将都不会“满意”，大喊“不老实”，“打倒×××”，“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时我最怕七十多岁的冯先生支持不住，由凳子上掉下来，但冯先生却像一块磐石一样，站着一动不动，接受批判。“文化大革命”后，我问冯先生：“当时几乎每天批判你，你是怎么想的？”他说：“当时我什么也没听见，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们相对大笑。在生活中有些插曲也颇有深意呀！

1966年秋，每天都有红卫兵串联到北大，也经常来到我家，或者抄家，或者贴上些大字报。要我“坦白交代”反毛主席罪行。我每天都得集中到南阁交代“罪行”，写检查，或者在校园挂着“黑帮×××”的牌子劳动。我爱人乐黛云在“反右”时被划为“右派”，也得在校内劳动。我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十二岁，在家里由我母亲照管，红卫兵常来我家，对他们心灵上的影响很大。于是我和乐黛云商量把他们送到我住在成府的岳父母家中。但两个孩子没有去住几天就被我岳母送回来，她告诉我们：“成府街道居民委员会说，这两个孩子是黑帮的孩子，要给他们挂上黑帮子女的牌子。”岳父母认为，这样对孩子影响太大，只能送回来。

1967年秋，有一天晚上，忽然来了一批红卫兵把我押送到燕南园56号的一间房子中，对我进行批斗，坐喷气式，问我为什么在门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像，而两边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对联。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申辩：“我这样怎么敢干这种事呢？希望红卫兵小将调查，如果是我或我们家的人干的，我愿意受到严厉地惩罚。”这一群人中，恰好还有一位哲学系的教员，他说：“如果我们调查出是你，你就是现行反革命。”批斗了我一夜，把我放了。以后也就没有为这事找我，后来听说是我们对门一家孩子们干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生死往往只在一瞬之间，如果当时没有哲学系的教员在，我也可能被活活打死，人呀都不知为何而死，悲夫！

这件事，使我和乐黛云非常后怕，于是我们就想方设法搬出经常有红卫兵光临的燕南园，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恰巧北大革命委员会认为原来教授住的房子太多，应该分出一些房子给职工住。我家住的燕南园58号是北大最好的房子之一，有七八间，自然要被分出去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主动要求搬出燕南园，搬到中关村较差的小平房中。这样我们一家在中关村280号三小间房中住，从1967年秋一直住到1982年。

从1966年6月1日广播了毛主席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肯定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我就作为“黑帮分子”在校内劳动，挨批、挨斗，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和认罪书，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等等，这样生活了一年多。当时我真心认为自己犯了严重错误，没有走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了。我对在国际饭店会议中批评聂元梓的发言都上纲上线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而且我内心真的下定决心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但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当时实在也搞不清，觉得跟随毛主席总没有错。而且下决心永远听毛主席的话，一切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要像林副主席那样，把毛主席看成是我心中的红太阳，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虽然一次又一次的检查，挖自己的思想根源，但以聂元梓为首的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都不满意，说我不老实。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只是承认由于我的立场错了，客观上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立面上了，而始终没有承认我在主观上就要反对毛主席。这当然不能令聂元梓等人满意。当时哲学系被定为“黑帮分子”的共十八人，大概都在这个问题上苦恼着，都在想方设法让聂元梓等人满意。

1967年秋天，北大红卫兵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另一派是原来和聂元梓一起写“五二五”大字报的孔繁、杨克明为首的“井冈山公社”。两派在权利分配上对立起来，以致发生了武斗。在这种情况下，两派都无暇来管我们这些“黑帮分子”，这样我们就自动解除了劳动，但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在家里老老实实待着，希望能由革命派把我们“解放”，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队伍中。

1968年秋，工军宣队进驻北京大学，使北大两派的武斗得以平息，接着在全校展开“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因而又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这期间哲学系“十八黑帮分子”一个个得到解放，只剩我和其他少数几个“黑帮分子”没有得到解放。这时有些被解放的“黑帮分子”，例如有位同志揭发我在清明节为父亲扫墓；还有位同志给我画了张黑线图，把我和邓拓、周扬、关锋甚至“帝国主义神父”等等联系在一起，于是大会小会又对我开展了批斗。在这中间，我得感谢一位新华印刷厂来的工人大姐，她再三开导我，让我好好反省，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在这挨批判斗争中，我一再作检讨，挖思想根源。一直到1969年夏才得到“解放”。没有多久林彪发出了“一号命令”，我和乐黛云还有我的儿子汤双就和北大二千余员工下放江西鲤鱼洲去劳动改造了。到鲤鱼洲劳动对我可以说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在那里我才真正体会到中国农民的困苦，才知道农活并不那么简单。插一天秧，腰腿之疼痛是难以忍受的；平一天水田的地，骨头几乎要散架。但中国农民就这样一天

一天、一年一年的过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确实出于真心地在劳动中来改造自己，使自己能和劳动人民更加接近。大概由于我改造得不错，1970年秋鲤鱼洲招收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哲学系的工军宣队就派我去当教员，并和这些从工、农、兵中来的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斗私批修。在我与工军宣队的同志们和工农兵学员在鲤鱼洲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我感到他们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和坦白的胸襟，对我是很大的教育。我到现在也还认为，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值得庆幸的。

#### ◇ 躲避批判进“梁效”

1971年夏，我们从鲤鱼洲回到北京，和鲤鱼洲同时，北京也招收一批工农兵学员，两地的哲学系工农兵学员就合在一起，并成立了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开始由杨克明同志和我共同负责，后来杨克明同志不大管了，主要由我来负责哲学系的教改工作，但我们仍受哲学系的工军宣队领导。由于我真想让工农兵学员学到点东西，孰不知这个愿望与当时整个的潮流全然不合，看看又要挨批，正是毛主席提出“让北大的教员参加《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编写工作”救了我，使我暂时躲过反右倾回潮的灾难，但却掉入了“梁效”这个深渊之中。

1973年秋天，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王连龙同志找我们谈话，他说：“清华的同志编了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毛主席看了，认为不好，他说找一些北大懂点孔孟之道的人参加，和清华一起来编写吧。”王连友同志说：“你们就和清华的同志一起编写吧！”对能参加毛主席要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我很高兴，除了我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之外，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私心。这时正是在批判所谓“右倾回潮”，在北大自然又掀起了一次批判运动。我是当时北大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的负责人，看看火又会烧到我身上，如果能到“梁效”，这场灾难也许可以躲过。

当时有几件事，我都会受到批判：一是，工农兵学员的水平实在太差（当然也有个别不错的），文章都写不通，王宪钧教授提出应该让工农兵学员学点“逻辑”；二是，我认为，只让工农兵学员学《毛主席语录》和《毛选》是不够的，是否可以学点“哲学的基础知识”，于是我就组织了几位同志（我记得有余其铨、程为昭等）编写了一份《辩证唯物主义论（提纲）》；三，“文革”前的哲学系副主任邓艾民同志一直没有解放，他找我谈了几次，我认为他的问题应该给以解决，就向工军宣队的同志反映了这个问题；四，为了“评法批儒”，中华书局重版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合编的《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其中说“孔子思想代表由奴隶主转化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一观点和毛主席认为孔子代表奴隶主的看法不一致，美化了孔子。中华书局在出版后，作了检讨，而我们北大太迟钝，也没有跟着检查，后经迟群主持的科教组庄印提醒，我才匆匆写了个不大像样的检查。以上这几件事已有大字报提出批评。火正要烧到我身上，正好毛主席有这样的指示，我真是战战兢兢，心中庆幸或可逃过这一劫。正因为我有这样的私心，因而参加“两校大批判组”我就十分卖力。

进入“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是依据毛主席的要求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开始只有十来个人，主要就是编材料，我算是编材料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材料编了若干稿，每稿都交谢静宜和迟群往上送，我们等着上面的修改指示。这份材料共八部分，在基本编成后，仅其中有一部分，上面认为不理想，要我们重编这部分，于是谢静宜、迟群就命令我带着两三个人修改这部分，我记得有中文系的周一良、孙静、陈羲仲，而其他人则转入写大批判文章，以便配合《林彪与孔孟之道》的分编。1974年1月《林彪与孔孟之道》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发件。由于我和周一良自始至终都参加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编写，所以被受命到各单位去讲解这份材料。分工我讲带有理论性的前四部分，如“克己复礼”之

类；周一良先生讲带有解释性的后四部分。当时除了由谢静宜、迟群指派我们在首都体育馆讲，我记得还应余秋里邀请在军队讲，应北京市委邀请在北京市委党校讲，好像还在其他地方讲过，现已记不大清了。

大概到这年二三月实际上在“两校大批判组”中分成两个组，一个组的主要任务是编材料组，接着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一个组是写大批判文章。我主要在材料组，“材料之二”的基本内容是所谓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份材料早在“大批判组”成立之前我们就看到过。在“两校大批判组”成立之前，江青曾召集一批在京学者（不仅仅是北大、清华的教员）开过两次座谈会，在会上就说到要批判林彪，这样就涉及到“五七一工程纪要”，并且传达了毛主席有关“评法批儒”的指示。这两次会，我都没发言，而当时人民大学的王世敏在会上作了相当长的发言，江青对她的发言很满意，当场说：“你是女状元。”所以在成立“两校大批判组”后，她和李家宽、宋柏年就成了该小组的三人核心成员之一。

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和之二，对我说是一“思想改造”过程，在“文化大革命”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孔子思想在春秋末期的作用》，认为：孔子是“从奴隶贵族向封建贵族转化的思想家”。现在毛主席说：“孔子是奴隶主的思想家。”我必须检查自己的思想以跟上毛主席的思想。如果从学术上说，在“文化大革命”前原来对孔子的看法就有不同，例如任继愈先生等就认为孔子是奴隶主的思想家；而冯友兰先生等和我的看法大体上相同。但是“批林批孔”是政治斗争，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不仅我，而且冯友兰先生也都必须跟着毛主席改变自己的观点，因为毛主席的一切言论都是“绝对真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我们这时已经把毛主席看成“神”。这种对毛主席的迷信也不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它是经过1949年以后的多次“思想改造运动”而形成的。如果说，从历史上看中国知识分子大多以“仕”途为归，因此面对帝王就比较软弱，再经过解放后的各种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和毛主席多次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污辱，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失去了自我，只能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具，而且常常是心甘情愿的。这无疑是一大悲剧。

为了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江青曾让我们到林彪住所毛家湾查看林彪的图书，当我们进到林彪的藏书楼，使我们吓了一跳，林彪的藏书竟有七万多册，其中线装书非常多，在一些线装的中国经典上常有林彪的“批语”，我当时曾把他在《论语》上的批语过录到另一本书上，现在我还保存着。我们当时翻阅林彪的藏书，当然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找一些所谓“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话，而且往往也是顺着毛主席的思路来加以曲解。我们以“五七一工程纪要”为基础，再加上林彪藏书中的“批语”，东拼西凑，编成了《林彪与孔子之道》（材料之二），由谢静宜、迟群送了上去，以后就没有下文。“材料之二”编完之后，我们这些编材料的人没有事可做了，于是也参加到写作组里。写作组的任务是：解释《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写“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文章。文章多半是三两个人合写，然后由谢静宜、迟群审定后，往上送。文章署名除用“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外，还有一些笔名，用得最多的是“梁效”。

从1973年下半年起到1974年四届人大前，有两件事应该说一下，一是，大批判组成员曾两次随从江青到天津，这是我和江青最近的接触，因而对她有直接的感性认识。关于去天津的过程，其他同志都会写到，我只想写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我们和江青一起在车上用餐，汪东兴虽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很像是江青的随从，江青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觉得很奇怪，但一想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而在我们面前常说她代表毛主席，而且给我们讲一些如何发动“文化大革命”之类的事，来宣扬她自己。我当时都信以为真，我想其他“梁效”成员也会信以为真。有一次，我不知为什么提到“斯大林”，江青突然大发脾气

说：“不要提他，不要提他。”吓了我一跳，以后我在江青面前不敢再说话。到天津后，我们并没有和江青住在一栋房子里，只是她召我们去她住的地方，我们才能去，去那里往往是和她一起看电影，我记得《反击》就是在天津看的。总之，江青给我的印象是“她真像一位颇为跋扈的皇后”。

另一件事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召见“梁效”成员（也还有几位非“梁效”成员参加）。有一次是由各位政治局成员向我们讲话，会议虽由周总理主持，但江青却唱主角，她讲了不少毛主席讲的一些“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话，好像有的地方还是根据纸上写的材料念的。这次会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同志的发言，他别的什么也没讲，只是讲“林彪并不是什么常胜将军，也打过败仗”。今天看来，邓小平实际上对什么所谓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是有他的看法的，也许他已看出这中间的问题所在。另一次召集我们开会，这次大概主要是“四人帮”和汪东兴等人参加，主要讨论“评法批儒”。江青让我们发言谈谈“儒家”和“法家”的不同。我记得发言的有田余庆、宁可等等。我是比较靠后才发言，我说：“儒家和法家的不同可能主要是两点，一是法家主张改革，而儒家则要维护旧制度；二是法家主张前进，而儒家主张倒退。”我说得很简单，后来听说，江青认为我的发言很扼要。但江青认为很扼要，这一方面说明，我在紧跟毛主席，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我是在迎合“四人帮”，失去了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因为我实际上对儒、法两家都并没有作什么认真研究。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二三十年来已被各种“思想改造”运动和作为批判斗争的对象绝大多数已经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而以领袖的是非为是非了；已经失去了“自我”，而异化为领袖的“应声虫”。这和中国历史上有骨气的“士人”的人格是背道而驰的。孟子可以“以德抗位”，陶渊明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李贽可以“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我却把这些传统的知识分子美德丢掉了，想起来十分惭愧，愧对于人，也很悲哀。从80年代初起，我较为彻底地觉悟了，我再不说那些违心的话，我要找回“自我”，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不再向非真理与半真理妥协。

#### ◇ 注释《老子》受夸奖

1974年底召开“四届人大”前，有天“梁效”的一位成员告诉我，说北大广播站正在介绍我，说我当选了“四届人大”代表。我当时也没听见是如何介绍我的，后来听说，因为对“评法批儒”的发言很受江青的肯定，这样当上了“四届人大”代表，当时我虽没有什么喜出望外之感，但也觉得自己还可以跟上现实的要求。

“四届人大”正式开会之前先开预备会。我们都集中在车公庄的礼堂里，等待领导人来接见和讲话。忽然江青等人来了，她看到了我，就说有事要找我，她就上了讲台，讲了一通，我什么也没听见，不知她要找我干什么。我赶快找工作人员，他们已经知道。散会后，工作人员把我带到一间小会议室，江青和她的随从人员，还有一些学者和艺术界人士在场，桌上摆着一些用封套套着的线装书，江青对我们说了一通话，我已记不清了，最后江青指着那一堆线装书说：“这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的影印大字本，你们大批判组去和今天的对照一下，加点注释，毛主席要。另外甲、乙本前后的部分也加点注。所加的注释都用朱红。”还特别对我说：“你会议就参加开幕式，其他会就不一定要参加了。回去你们就快做吧！”因此，我只参加了“四届人大”的开幕式就回“两校大批判组”了。

回去后，我就向谢静宜、迟群和李家宽（当时“两校大批判组”的负责人，8341军宣队干部）汇报。他们就赶紧组织批判组的人员，如魏建功、吴小如、田余庆、周一良和我等人参加来作注释工作。我们这些人写批判文章不大行，但做注释还比较有点办法，特别听说毛主席要看，就更加积极认真地做，很怕出点错误。后来听说毛主席对我们的注释工作很满意，当然我们很高兴，有点“受宠若惊”之感。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了！

没多久，谢静宜、迟群来大批判组说，江青要来“看大家”，并且要听我们讲《老子》，因为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就要我作准备。为此，我把过去我们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的带注释的《中国哲学史资料辑要》中的《老子》部分，每句都详加解释，有的甚至译成白话，怕被江青问住。一日，江青带了一帮人（可能有汪东兴）来大批判组住的“北招”，这时学校领导周培源、王连龙等和谢静宜、迟群也都来了。江青来后，她大声说：“我向你们问好，也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们当然也相应回答：“江青同志好，毛主席好！”她说了一些话，我一句也没听清，因为我很紧张，不知如何给她讲《老子》。忽然江青说：“谁给我讲《老子》？”我原来坐得离江青较远，只得走到她近处，带着大字本马王堆《老子》甲、乙本，打开来，因马王堆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因此开始就是今本的三十八章。我刚开始讲了一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江青就讲开了，讲起她怎么读《老子》和许多与《老子》不相干的话，因此我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可以没事了。因为我总怕哪句话讲错了，惹上麻烦，甚至可以坐牢呀！

1975年的4月底或5月初，在当时“科教组”（相当于中央的教育部）工作的孙长江同志来找我，他告诉我说：“毛主席有一段指示，认为现在不应反经验主义，而要反教条主义。”当时我也没有认真想想毛主席为什么有这样的指示，只是当作一条新闻告诉了两位大批判组成员。不知哪位先生把这事报告了李家宽、迟群等，后来听说迟群大发雷霆，说让我回哲学系，不要留在大批判组。如果当时我被遣送回哲学系，今天我也不太深深的自责，也会得到善良的人的一些谅解了。正恰这时，我不明白什么原因，谢静宜、迟群决定大批判组的大部分成员都下工厂去劳动，我和李家宽、池中原下放到北郊木材厂，并要求我们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又听说迟、谢两人已经决定缩减大批判组成员，我也在缩减之列。在北郊木材厂时，到现在有两件事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有一天孙长江来找我，告诉我说，毛主席的指示是批“四人帮”的。那时“四人帮”提出要反“经验主义”。这件事使我大为吃惊，原来上面的矛盾那么复杂，我们这些人是搞不清的，我想：“一切听毛主席的总没错。”第二件事是，当时北郊木材厂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最高层领导要求制造一个可以升降的大床，有位工人说：“这大概是给毛主席做的。”这事被领导知道，听说这位工人马上就被抓起来。这事给我震动很大，使我感到，决不能乱猜测、乱说，不知什么话没说对，可以惹上“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现实生活。写到这里，使我想到两千多年中国的专制社会大体上都是这样，宫廷的斗争从来没有断过，而小民对之全然被蒙在鼓里，常会莫名其妙的因一句话而获罪。看来政治要走上较为合理的轨道，“政治上的透明度”应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一条。

我们是5月底、6月初才到北郊木材厂，但到7月中旬，忽然谢静宜、迟群把我们全部下放的“梁效”成员都从工厂召回大批判组。回到大批判组，谢静宜、迟群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批《水浒》的指示，要求我们组织起来赶写大批判文章。对这事，开始我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不知要搞什么。慢慢我们才知道，由于清华大学的刘冰同志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对谢静宜、迟群的一些言行和作风做了一些批评。毛主席看了这封信说：“这是针对我的。”这问题就大了，到12月初，已经发展到在“科教组”批判当时的领导人周荣鑫，而且已涉及当时提出的对社会政治进行“改革、整顿”的方针。这样，我感到问题可能很严重。1976年1月6日，周恩来总理突然去世，我和全国人民一样都很哀恸，我们自发地在大批判组设了个悼念的灵堂，但谢静宜、迟群看到后，要我们撤掉，说：“北大、清华各有一个就行了，不必设那么多灵堂。”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毛主席没有出席，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可是追悼会是由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我当时想大概这次运动不会真正整到邓小平同志吧！可是就在总理追悼会的那天，孙长江同志来找我，他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要整邓小平。”他的意思就是让我想法离开大批判组，我说：“我很难离开，只能混下去，要离开不被抓起来，至少又得像“文化大革命”初那样挨批判斗争。而且现在大批判组还没有一个人敢离

开。”孙长江同志说：“那好吧！就各为其主了，但你想少做什么事，不要多说话，静观其变吧！”事情发展很出乎我的意料，4月5日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自发的悼念周总理、批判“四人帮”的运动。谢静宜、迟群下令：大批判组的成员不准到天安门去。我没有去，但我的爱人乐黛云和儿女们都去了，而且我们一起写了一首悼念周总理的长诗（由乐黛云执笔）。孩子们还从天安门抄了不少当时悼念周总理的话。没几天发表了毛主席签署的免去邓小平同志一切职务的命令，只是保留他的党籍。这时我才比较清楚地感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5月，4月5日的事件平息了，抓了一些人。这时谢静宜、迟群让我们大批判组写批邓小平的文章，而且要联系批《水浒》的“投降主义”路线来批。我和田余庆、孙中原等人是一个写作小组。但我们一直没有写出什么批邓的文章来。有天我看《论语批注》，看到其中写到孔子当鲁国司寇时把被放逐在齐国的鲁昭公的坟由齐国迁回鲁国，与祖复合葬，说这是“为鲁昭公翻案”。我就根据《论语批注》的这个故事写了一篇文章，说明孔子从来就要恢复旧制度。在“四人帮”垮台后，审查我时说这篇文章是影射现实。对此，我可以说当时我的确没有想到这个意思，但不管如何，它起了坏作用，我应自己“反身自责”，应该深刻来认识像我这样完全没有什么党内政治斗争经验的人决不要再沾中国政治的边。教训太深刻，生活太艰难。

#### ◇ 接受审查想自杀

9月9日毛主席去世，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毛主席在一切都好办，现在毛主席去世了，我们不知应该跟谁了？”并且我在大批判组也向别人说了我的看法。当时，我心里确实不知道如何办，因为过去我一切都听毛主席的，认为毛主席总不会错。而且内心实际上存在着，错了也是因为紧跟毛主席而发生的，总可以为自己“开脱”。

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谢静宜、迟群也被抓起来，大批判组全体成员被集中起来，进行审查。在这一年半的审查期间，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反复作了多次地检查和揭发。主要要我们交代和揭发的问题是：“四人帮”、谢静宜、迟群是如何反周总理的；我们这些大批判组成员是如何接受“四人帮”的指示反总理的。现在我仍然可以说，在大批判组中我从来没有听到“四人帮”或谢静宜、迟群说到过“周总理”。因此，在我的检查中又陷入了和“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一样，那时聂元梓的校“文革”检查我们，要我们交代如何反对毛主席；现在“梁效”专案组又要我们交代如何反对周总理。而我们这些书生哪里知道中共中央上层之间的斗争呀！在审查中，我渐渐了解到“四人帮”确实要反对周总理，同时我也想到这大概也是毛主席的意思。因此，在我的检查中就再三说明，我和其他“梁效”成员确实在客观上帮助“四人帮”（如果严格地说应是“五人帮”），犯了反对周总理的严重错误，但我和许多“梁效”成员在主观上并没有要反对周总理。对这点，我无意为自己辩解，就像“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说我反对毛主席一样是无法为自己辩解清的一样。

在开始审查我们的时候，我还可以请假回家。有一次，在我为是否要违心地承认自己在主观上就是要反周总理的极度苦恼中，我真的想不清楚，为什么毛主席没有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能说清这一切问题？我的精神几乎陷入崩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请假回家看看，想看看妻子乐黛云，我们有二十五年共同生活的苦难历程（她二十六岁就被划为右派，而我自1957年反右斗争后，历次运动都受到批判）；想看看孩子们，不知他们今后如何度过一生（因为他们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都考得很好，但因我的原因没有学校敢录取他们）。我想着看过他们以后，回“梁效”集中地要经过未名湖，不如跳入湖中，了此一生吧！但正巧孙长江同志来我家，他对我说：“事情总要过去的，不要乱交代，就是坐牢



也没什么，早晚得放你，可以准备点换洗衣服，一定要挺住，我们能做事的时间还长着呢！”听了孙长江同志的话，我非常感动，打消了我投湖自杀的念头。

我参加“两校大批判组”，不管当时有种种客观原因，不管是毛主席指示让我们参加的，但我自己是不能原谅自己的，我也不要求别人理解“梁效”同人的处境。我自己应该严厉地责备自己，正是我在开始时考虑想逃避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自愿进入“梁效”；正是我迎合江青等所传达的毛主席关于“评法批儒”的指示，而作了被江青肯定的发言；正是我在批邓开始时，因为怕有牢狱之灾，而没有听孙长江的话，毅然离开大批判组。这都说明了我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三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始终是被批判的对象，绝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而以领袖的是非为是非；绝大多数人都失去了“自我”，而异化成为领袖的“应声虫”。领导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无意造出来的“大神”。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士人”都是依附于皇帝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像我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毛主席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作为政治领袖说，他说出他想说的话。但是中国历史上也还有极少数有骨气的士大夫他们可以对抗皇权，对抗世俗流行的观念。孟子可以说“以德抗位”，陶渊明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李贽可以“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我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可贵的美德全都丢掉了。对这些，想起来十分惭愧，愧对那些古人呀！我很悲哀。但这也教训了我，1978年后，我渐渐地有了一些觉悟，到80年代初可以说较为彻底觉悟了，一切应根据自己的“良知”，不再说违心的话，不管是谁说的，我都得用自己的头脑来问一问：是否合理？是否有道理？我再不崇拜任何政治领袖人物，找回“自我”，恢复和发扬知识分子的骨气，不再向非真理反真理的那些带有欺骗性的言行妥协。

“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民族说是一场灾难，像是一场噩梦，这不仅是由三十年专制主义新传统造成的，而且它有几千年深厚的专制主义的老传统的根基。虽然说，“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种种怪现象有其偶然性，但究其根源不得不看到专制主义往往会出现“造神”运动，“神”被造出后，他就完全把人控制住了，人被异化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我，没有能力不“拜神”，从而犯了错误。因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我终身难忘，它对我是一面镜子，我必须从中来时时反省自己。

□ 选自汤一介《我们三代人》

~~~~~

【亲历者言】

林彪“紧急指示”前后

• 李根清 •

◇ 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

20世纪60年代，由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引发的中苏两国关系紧张，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恶化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苏联沿中苏、中蒙边境苏、蒙一侧陈兵百万，不断挑起边境冲突和摩擦。1969年3月2日和15日，苏军入侵我乌苏里江中的一个孤岛——珍宝岛，中方打了一场自卫反击战。珍宝岛之战，我方获胜，击毙击伤苏军百余人，击毁、击伤苏坦克、装甲车十余辆，并把一辆沉入江底的苏T62新式坦克捞上来，运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展览。苏方寻机报复。8月13日，在新疆塔城铁列提克地区，苏军出动一个营的兵力，在坦克、装甲车及武装直升机支援下，伏击我一个30人的边防巡逻分队，我方人员全部牺牲。

这期间，我方获取的情报显示：苏打算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多方面的情报表明，当时的苏联确实动了对我动武的念头。

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指出：“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按照这个精神，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战备活动。毛泽东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打败“苏修”的“乌龟壳”。

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会晤，双方商定互派代表团，10月20日开始在北京进行边界谈判。但是战争阴霾并没有被驱散，我方仍不断获取情报，苏方没有放弃对我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企图，仍在继续加紧战争准备。中国领导人担心，苏联可能利用谈判做烟雾对我国实施入侵，因而对苏联可能发动的包括对北京在内的核打击保持高度戒备。这一时期，林彪从中苏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苏军一旦发动进攻可能采用的方式、主要突击方向，到我方可采取的应对措施，特别是在敌主要突击方向上的兵力部署、战略设防等，都做出过指示。

◇ 关注“三北”

我国“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是与苏、与蒙边境接壤地区，尤其是“北线”（华北地区），由于苏在蒙古驻扎军队，建立军事基地，距离北京最近，大部地区地形地貌比较适宜敌机械化部队运动，对我安全威胁最大。所以，林彪指示，加强“三北”地区的防御要以“北线”为战略防御的主要方向。林彪还认为，苏如果对我动武，很可能会像一年前入侵捷克那样，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他说，苏军一旦入侵，就会天上地下一起像洪水一样铺天盖地压过来。他指示有关部门切实加强情报工作，及时发现、报告敌对我发动突然袭击的蛛丝马迹，事大事小都要报。由他提议设立的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防突办”，设在总参作战部），及总参情报部专门向林办派资深参谋，随时联络报告情况。林彪让“防突办”搜集整理“二战”以来突然袭击的战例，如德国闪击波兰、日本偷袭珍珠港、盟军诺曼底登陆、中东“六七”战争等，特别嘱咐要把苏联入侵捷克编进去。《二战以来突然袭击战例》编成后，分送给毛泽东和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林彪自己研究，还特地要我送给林立果一本。林立果组织人写了一篇《要准备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文章，登在《空军报》上，还找来一些“二战”中突然袭击战例的电影资料片放给林彪看。林彪提出，加强部队“三打三防”（打飞机、打坦克、打伞兵，防原子、防化学、防空降）训练，加强战略预备队建设，加强防空体系建设。9月下旬，军委办事组主持召开“三北”作战会议，全面部署战备工作。林彪在会上讲话，要求全军“用准备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北京地铁开通那天，林彪乘地铁视察，指示说，地铁是战时重要运兵和疏散通道，要充分利用。林彪还让秘书通知有关部门，让他们搜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苏联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的个人信息资料。他认为，苏联领导人的性格、经历和个人品质会影响战争与和平的取向，以及战略战术的运用，对指导战争十分重要。

国庆20周年前夕，林彪特意坐车到北京西郊机场转车，回到住地毛家湾便叫秘书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前来开会。林彪对他们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做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

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正欢欢乐乐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趁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蒙古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情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一律要在今天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去。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伞兵。另外，节日的其他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10月1日、2日、3日，1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林彪特别强调：“只有我们准备充分了，敌人才不敢贸然发动进攻。”

按照林彪的指示，军委办事组和空军连夜组织实施，国庆节的战备方案也报到了林办。

国庆节前，林彪住地也进入了战备状态。地下工事内进一步完善了工作、通信、生活设施；重要文件和机密档案全部转移到了地下；秘书安排了战备值班，内勤研究了林彪紧急避险方案。

◇ 视察华北

国庆20周年庆典是在表面平静、欢乐的气氛中度过的。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种外松内紧到了何种程度：“三北”部队奉命高度戒备，中远程雷达不间断侦测敌方动态；总参作战部一名副部长等人带着电台在天安门城楼值守，随时联络报告情况；天安门城楼电梯设专人守护，确保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随时撤离；故宫午门外空地上一架直升机随时待命；有关内卫人员都被告知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这一切只为争取7～9分钟——那天留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从天安门上撤离的时间只有7～9分钟！因为，苏军如果从伊尔库茨克或在蒙古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到达北京上空只需飞行7～9分钟。

国庆节平安度过了。可林彪认为，在10月19日以副外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之前，每天都存在着苏军入侵的威胁。他甚至担心，一年前发生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会在北京重演——从降落在首都机场的苏联飞机上走下来的不是友好使者，而是荷枪实弹的苏军特种兵！

国庆节一过，10月5日，林彪就在吴法宪、阎仲川及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参谋长马卫华等人陪同下，乘飞机视察北京北部地区及张家口、大同、雁门关一带地形，接见当地驻军负责人，对北线的战备工作做出指示。几天后，又专门听取北京军区关于北线设防问题的汇报，并就在山口地区如何阻滞和歼灭敌机械化部队谈了自己的意见。

大战之前看地图、看地形，将未来战场情况熟记于心，是林彪指挥打仗的一贯做法，他曾把这一条当作打胜仗的诀窍向他人传授。在这次备战部署中，林彪也认真研读了“三北”地图，在空中看地形的几个地方也是他亲自选定的。

国庆节前，也就是在“三北”作战会议期间，林彪接连几天看“三北”地图。这幅长宽都有4米多，质地柔软，印刷清晰，装裱精美，带轴的百万分之一军用地图，是总参作战部专门为林彪绘制的，卷起来有碗口粗，扛起来有20多斤重，平时就放在保密室文件柜上。那天，一听内勤说林彪要看“三北”地图，我赶忙把地图取下来送到林彪那里。因为图幅太长，办公楼通往客厅的走廊无法通过，我是从东院绕道西院从大门扛进客厅的。地图挂不到墙上，只能铺在客厅的地毯上。

林彪站在地图前端详了一会儿，先让我报告比例尺，然后就开始点地名。他每说出一个地方，我就在地图上指出它的位置，并按照林彪的要求，用米尺在图上量一下这个地方到北京城的大致直线距离，然后报告给他。

“居庸关。”这是林彪点的第一个地名。我立即用打台球的球杆，指出居庸关在地图上的位置并向他报告：“居庸关。”然后把量出的居庸关到北京城的大概直线距离报告给他。

“南口。”林彪点了第二个地名，我又马上指出南口的位置并报告南口距北京城的距离。

“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林彪接着点，我就接着报。

这几个地方及它们与北京的距离，林彪并不陌生，20年前他指挥平津战役时就是知道的，但我还是按照他的要求一一报告给他。南口、居庸关是北京的北大门，战时必守之地。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则是北京市的水源，与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战时一旦遭敌机轰炸造成溃坝也会对人民生命财产构成危害。为此，林彪曾建议排水，后请示周总理，周派人调查后认为，水库只有“半盆水”，“对北京影响不大”，遂放弃排水。

接着，林彪又相继点了张家口、大同、五台山、雁门关这几个地方和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几个长城沿线的口子，还点了紫荆关。

内蒙古一线，林彪先让我指出的是从蒙古经二连、集宁、大同、张家口通往北京的铁路、公路及两侧地形情况，然后让我指出包头、呼和浩特、集宁、多伦、赤峰、通辽这一线的草原、沙地，及通辽到沈阳、通辽到长春一带的地形。林彪看这些地方的地图时，长时间蹲在那里拿着放大镜看，边看边喃喃自语地说：“草场、沙地是畅通无阻的哟！”他可能是担心苏军会利用有利地形，以大集群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突然从正面向北京扑过来，同时从东、西两面迂回威胁北京。

蒙古方面，林彪提到的是乌兰巴托和乔巴山这两个地方。节前他同黄、吴、李、邱谈话时说：“苏联设在蒙古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林彪说的苏军在蒙古的基地中就有乔巴山。从地图上看，就在北京北方不远的地方。

苏蒙边界一线，林彪首先点到的是苏联的伊尔库茨克，然后是赤塔。我随即指出这两个地方，并把到北京的距离报告给他。这两个地方都是苏联东部地区的军事重镇，伊尔库茨克还是苏联后贝加尔军区所在地，我方不少有关苏军活动的报告中经常提到这两个地方。林彪关注苏军在远东和蒙古的军事动向，自然重视伊尔库茨克和赤塔。

林彪踩在地图上，随着我的球杆不停地挪动着脚步。一会儿站着让我指着地名地形报告给他，一会儿又蹲下来拿着放大镜自己看，往往一蹲下去就看许久，我搀着他才站得起来。开饭了，地图仍摆在地毯上不让动，下午继续看，直到他说不看了，我才能把地图收走，第二天接着看。叶群则抓紧时机，叫摄影师为林彪照相。

一连几天，林彪就这样看“三北”地图。他不仅对重要城镇名称张口叫得出来，而且对山脉、隘口、河流、平原、草场、沙地、铁路、公路等也不陌生，连京西阳原、京东迁安这

样的小地方都能随口说出。如果我平时不是一个地图迷，曾几次研读过“三北”地图，真不知道会怎样尴尬。林彪研读地图的方法和细心、耐心都是我不曾想到的。

看地图的那几天，林彪还不时口述几句话让我记录下来。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在敌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必经的山口地区，可采取炸山抛石、挖壕、凿洞等办法，构筑工事，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多个层次，多种火力，立体设防，以阻敌滞敌，为大量歼敌和加强纵深防御赢取时间。

后来，我方搞了不少“卡口子”工程，就是根据林彪这一指示进行的。林彪还提出加紧研制、生产反坦克武器，加强部队打坦克、打飞机的技术战术训练等，都很快得到落实。

◇ “紧急指示”

毛泽东也担心苏联人甩导弹、原子弹。他指示：中央领导人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下来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分散到外地。根据这一指示，10月14日，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由周恩来、汪东兴研究提出疏散方案，汪东兴负责具体实施。中央要求，除周恩来、黄永胜留京主持工作外，其他人在10月20日前必须全部撤离北京。黄、吴、李、邱等人组成军委前指进入西山指挥所。

我看到，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报告的疏散方案是：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去苏州，陶铸去合肥，刘少奇去开封，朱德、李富春去从化，邓小平、陈云去南昌，董必武去广州，叶剑英去长沙，刘伯承去汉口，陈毅去石家庄，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去长辛店……这是中央在临战前采取的保障领导人安全的一项措施。

10月14日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便动身去了武汉。林彪10月16日到达苏州，18日下午5时许向秘书张云生口述了一份给黄永胜的电话稿，部署当前战备工作。主要内容是：一、要防止苏联利用边界谈判做烟雾对我进行突然袭击，特别是10月19日、20日要高度警惕；二、对重型武器装备、飞机、舰船等要立即采取疏散、隐蔽措施；三、要设法确保武器弹药的供应，特别要加强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四、二炮（战略导弹部队）要做好发射准备，随时待命；五、要组成精干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要加强作战值班，保证通信联络畅通。

张云生给林彪口授的电话稿写的标题是《首长让我给黄总长去电话》。经请示林彪后，他与叶群商定，“压两个小时”，由叶群将“六条”报告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由张云生传给在北京的黄永胜。事后回忆时，张云生坚定地认为，“按叶群平时一贯突出主席的心态，她打这个电话的时间不会比我晚”（见张云生《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册第568页）。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说，叶群没有通过他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看到的是中央从北京转送到武汉的“电话记录传阅件”，这样，就给林彪加了一个“背着”毛泽东“擅自”发布战备命令的罪名。那些年，汪东兴与林彪、叶群的关系是密切的，往来也十分频繁，通过他向毛泽东报告事情是常有的事。另外，林彪事先已表示此事要向毛泽东报告，叶群并说由她向毛泽东报告，就不可能不报告，也不可能将“六条”先传给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再由周恩来批出“电话记录传阅件”，送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紧急军情不可能这样辗转。汪东兴这样说，是想躲避在“一号令”问题上他与林彪有关联。当然，这一点完全可以从档案中得到证实，即使毛泽东看过林彪的“六条”就“烧掉”了，但作为“传阅件”，传阅过程还是有据可查的。

1969年10月18日20时44分，军委前指开始以电报形式将林彪的指示下发全军执行。下发时做了文字加工，更具体、更明白、更便于执行了。总参作战部的高参们给电报写了标题、编了号，因为是军委前指进驻西山指挥所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所以叫作“《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之后又陆续发出第二个号令、第三个号令。第二天一早，林办便陆续收到各大军区和军兵种的报告，几乎所有这类报告上都把贯彻执行第一个号令情况作为标题。

10月19日，即苏联代表团由伊尔库茨克经蒙古入境那天，林彪打破午休习惯，在客厅来回踱步，让秘书张云生保持与总参作战部的电话联系，随时向他报告苏军动态和苏联代表团所乘飞机的飞行状况，直到听秘书报告说苏联代表团飞抵首都机场，机上人员已从飞机上走下来，库兹涅佐夫由我方人员陪同乘车离开机场，我国“三北”边境无异常情况，才肯去休息。

那些天，我们留守在北京的林办秘书与在苏州的秘书天天互通情况，在苏州的秘书把林彪的“六条”用保密电话传回了毛家湾，我们才知道“一号令”的详细内容。我给苏州传回来的“六条”做了个标题，叫作《首长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誊清并交几个秘书传阅后存入档案。第二年4月26日，林彪从苏州回到北京，张云生把他记录的《首长让我给黄总长去电话》原稿移交给我，一并归档。

“九一三”事件后，发布“紧急指示”成了林彪的罪行并向全党公布。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24号”所公布的林彪罪证材料里，没有采用张云生的原始记录，而是采用了我为命名为《首长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和总参前指的发电稿《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中央文件上这样写道：“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这是“紧急指示”上的时间，我是根据苏州电传记录的。这个时间比军委前指下达“一号令”的日期早一天——作者），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十月十八日，由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

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人们被这种说法误导，对当年的战备工作进行口诛笔伐，阎仲川甚至因为搞了“第一个号令”这个编号而被审查多年，并遭贬职。

1980年“两案”审理时，没有采纳那个说法把林彪发布“紧急指示”定为罪行。林彪分管军事工作，在国家面临外敌可能突然入侵的危机时刻，断然采取防范措施，是职责所系，是对国家安全负责任的表现，不应该受到指责。按程序，林彪的命令是应该先报毛泽东批准后再发布实施。但由于距苏联代表团抵京只有十几个小时了，时间紧迫（这也是我把林彪口授的电话稿定名为“紧急指示”的原因——作者），林彪临机决断，边斩边奏，也不能说不可以。毛泽东并没有制止命令的下达，也没有制止命令的执行。再说，毛泽东本人在4天前就做出了紧急疏散在京老干部的决定。

林彪发布“紧急指示”也并不表明他认为中苏之间一定会爆发战争。其实，林彪真实的判断是“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他强调“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做好战备工作”，“要做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完全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思考。准备打仗，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打仗。整军备战，严阵以待，常常是扼制敌人侵犯的有效手段。

□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11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